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观视阈下的 中国海洋文化主体自觉*

洪 刚 洪晓楠

【内容提要】中国海洋文化的当代建构旨在从实践历史和实践诠释的角度探索其在当代中国海洋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实践路径，将中国海洋文化的理论分析、历史分析和价值取向外化为具体的、可以操作的实践方式。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的海洋文化观作为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建构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指导，标示了海洋文化的中外之分和古今之别，明晰了海洋文化的主体性维度，实现了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主体自觉。通过对中国海洋文化发展主体的确证和中西海洋文化体用关系调试，建构出理论面向实践、价值取向清楚的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实践路径，从海洋文化自觉走向海洋文化自信，并最终形成开放性的海洋文化视野和由主体内化到主体外化的海洋文化实践方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综合创新观 中国海洋文化

作者简介：洪刚（1979-），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大连海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辽宁大连 116023）；洪晓楠（1963-），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辽宁大连 116024）。

中国海洋文化主体自觉需要在“文化自觉”的语境中才能得以体认。“文化自觉”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自觉，通过具体的历史实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背景中展现，其内在逻辑通过文化空间直角坐标系的三个维度表现出来，形成了“文化发展三向度坐标”：“时间轴”标示着文化的古今问题，沟通着传统与现代，表征出文化的历史性维度；“价值轴”标示着文化的品格问题，彰显着文化的价值意蕴和文化功能，表征出文化的价值取向维度；“空间轴”标示着文化的中外问题，展现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表征出文化的主体性维度。三者共同形塑特定文化内涵的三维立体文化景观。中华民族既是中国海洋文化的认识主体，也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实践主体、创造主体。“中国海洋文化主体自觉”就是作为中华民族整体和每一份子理性地面对世界海洋文化的多元并存，在客观认识中国海洋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积极构建实现中国海洋文化自觉的客观环境实现对主体身份的确证，最终通过对中西方海洋文化的体用关系调试，不断发挥海洋文化主体的创造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准确定位海洋文化自我身份，达到对中国海洋文化的自知与自信，实现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构建主体认识的文化自觉。

一、中国海洋文化的主体认同危机

近代以来，中国危亡系之于海。自从海上国门被西方列强粗暴打开之后，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文化自信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18JF030）和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文明转型中的中国海洋文化发展逻辑与话语建构研究”（L17BKS017）的阶段成果。

问题就成为中国思想界关注的核心主题，而这种文化思考必然会强烈地映射在海洋文化领域，具体表现出对海洋文化的思考与诘问：怎样认识中国的海洋文化传统？如何面对西方海洋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构成了一种集体的文化主体身份焦虑，并上升为民族文化和海洋文化的认同危机。这种认同危机集中反映在对海洋文化“古今中外”问题的认识上，对此人们有以下几种认识。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西方海洋文化的差异是时代性的，其差异主要是有古今之变，而非中外之别。这种观点在文化整体上以自由主义西化派为代表，主张全盘西化。在海洋文化领域，他们认为，海洋文化的差异主要是人类海洋文化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差异，而不是中西方之间文化上的差异。以20世纪80年代的《河殇》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是以大陆文化为代表的“黄色文明”，西方是以海洋文化为代表的“蓝色文明”，西方代表了文明发展的先进成果，因此，主张向西方学习以改变中国落后的海洋文化。全盘西化论者以西方海洋文化的历史发展和价值标准来衡量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过分强调海洋文化的古今之别，而忽视海洋文化的主体性差异，忽视了中国海洋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历史传统，否定了中国海洋文化传统的价值，造成了主体性身份失位。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西方海洋文化的差异是民族性的，其差异主要是中外之别，而非古今之变。这种观点在整体文化上是以“儒学复兴论”为代表，认为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要复归儒家传统，反对欧洲中心论，反对现代化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倡导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但是，这种观点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又陷入了华夏中心主义的泥沼，夸大了儒家文化的超时代性和普遍性的品格。在海洋文化领域这种观点表现为，过分强调中国海洋发展过程中个别历史阶段的代表性意义，夸大了海洋文化在中国整体文化中的影响力，尤其忽视了中国海洋发展中王朝海事与民间海事的二元化结构，如过分强调郑和下西洋和平交流的一面，忽视了王朝统治的政治性背景，无法处理好海洋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辩证关系，造成了主体性身份错位。

第三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观。“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观”认为，既要承认文化的古今之变，也要承认文化的中外之别，文化既有时代性的变迁，也有民族性的差异。就海洋文化而言，海洋文化的时代性表现为人们的海洋文化会受到知识构成和实践发展的影响。随着对海洋自然属性和地理范围认识的拓展，人们对人与海洋关系的认识也会不断深化，不同时代的海洋文化会留下不同时代的烙印。海洋文化的民族性表现为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在认识与开发海洋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历史体验和价值观念，不同民族的海洋文化体现着不同民族的特色。在讨论海洋文化的时候，我们既要考虑到时代性差异，也要考虑到民族性差异。因此，中国海洋文化与西方海洋文化不仅有古今之变，而且有中外之别。

以上观点反映了人们对中国海洋文化主体身份的不同认识。实现中国海洋文化的主体自觉，首先有必要确证中国海洋文化的主体身份。

二、中国海洋文化的主体身份确证

中国海洋文化的主体身份确证需要在实践中积极构建实现中国海洋文化主体自觉的客观环境，这种环境的形成既源于历史文化传统的积累，也离不开时代赋予的历史机遇。

一方面，中国拥有深厚的海洋文化传统和庞大的海洋社会群体，为中国海洋文化主体确证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中华民族悠久的海洋发展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形成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传统价值资源，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强大精神纽带。与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华文明表现出更

加旺盛的生命力,中华先民的海洋文化传统以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厚的价值意蕴穿越了漫长的历史,成为今天我国海洋文化开拓创新源源不断的历史资源和精神财富。一直到今天,在我国的海洋生产和生活中,古老的中华海洋文化传统依旧是鲜活的,中国庞大的海洋社会群体和丰富的海洋活动一直延续着先民的海洋传统:古老的海洋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依旧在维系,四海海神崇拜和妈祖海洋信仰依然在延续,港船渔市的规则和禁忌照例被遵守,敬海谢洋与人海和谐的理念一直受到推崇,精巧的修造技术和海洋知识仍旧在传承。这一切不仅存在于文明史的记录和丰富的典籍之中,而且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的中国海洋社会之中;不仅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宏大历史叙事,而且是民众海洋生活的生动写照。从历史上沿续而来的深沉博大的中国海洋文化传统是当代中国海洋文化开拓创新的深厚资源,也是确证中国海洋文化主体身份的现实依据。

另一方面,“中国道路”的模式创新和“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海洋文化的主体身份确证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近些年来,中国道路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通过努力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其成功经验被总结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以和平方式、合作共赢方式实现发展崛起的独特经验和道路,充分体现了中国善用全球化的智慧和韬略,这与以往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路径都不同。”^①其本质正是在承认文化多元的前提下通过主体身份确证来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以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和平共处为出发点,探求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连接着历史与现实。在历史上,海洋发展长期处于社会发展主流之外,涉海生产是最艰苦的领域之一,海洋民生之多艰,生活的困顿成为海民为寇为盗的重要原因。自近代以来,中国多次遭受外来侵略而难于自保的重要原因就是国力孱弱,海洋没有成为富国强兵的重要支撑,反而成为外敌入侵的重要通路。在新时代,建设富强之海成为中国人民追求的发展目标,海洋发展要为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的富足提供物质支持与保障。建设海洋强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海洋发展的重大目标,更是中国海洋事业伟大复兴和新时代海洋文明建构的行动指南。中国海洋文化的主体身份确证是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建构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中国海洋发展实践必须解决的理论与实践前提。

三、中西海洋文化的体用关系调试

中国海洋文化是中国文化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海洋文化的当代变迁与面对的问题也是在中国文化整体发展格局下衍生的,因而从整体上探讨近代以来中国海洋文化与西方海洋文化的体用关系甚为必要。

人类对海洋的认识与开发既演绎了历史的变迁,也产生了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西方海洋文明开启了四海连通的进程,带给西方世界发展与繁荣,但也因海洋过度扩张而导致各种危机;在带来创新和进取精神的同时,创造了“异质文明”的假说,也通过扩张和征服造成了对其他文明的破坏。正如《文明》一书的作者尼尔·弗格森所言:“与所有伟大的文明一样,西方文明也具有两面性:有其崇高的一面,也有其卑鄙的一面。”^②中国海洋文化主导的“环中国海文化圈”在传统海洋社会的影响力遍及东亚,以“四海和谐、天下一家”的观念影响了海洋农业文明秩序,形成了东方海洋文化传统的基本特征。进入大航海时代,在西方海洋商业文明的冲击下,这一海洋文化传统被动融入

① 李丹:《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互形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4期。

② [英]尼尔·弗格森:《文明》,曾贤明、唐颖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中文版前言。

现代国际秩序,使民族文化遭受挫折和冲击。

新时代世界海洋文化的重建必将致力于推动人的全面进步与世界的和谐发展,构建世界海洋命运共同体,真正还原世界以多样性,开创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通过中西方文化体用关系的调试,开创人类文明交往的新范式。“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观”最重要的理念是对中学和西学进行辩证的、历史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此基础上,文化体用的三层论说可以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体用主张,将文化体用论从二元论引向三元或多元,突破中西、体用二元论说的弊端,在丰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观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体用观,“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两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放在同一个三维结构的模式中”^①。从海洋文化角度来看,这种体用观表现为三个层次。

第一,从海洋文化形成的物质基础来看,以海洋发展的历史实践为体,海洋文化为用。这一层次上的体用关系指向世界多元海洋文化发展过程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使海洋文化突出表现为民族性差异,标示着海洋文化的中外之分。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即社会存在是体,社会意识为用,一般来说,在这个层次上谈体用是最广泛的。对于海洋文化而言,其依存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实践为体,不断创造和发展的海洋文化成果为用,从这个层面来说,表征了海洋发展实践与海洋文化成果的体用关系。从古至今,人类的海洋活动在历史上表现为多元化的实践主体,包括腓尼基人、埃及人、中国人、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西欧人等。历史上不同时期以区域、族群表现出的海洋活动实践主体是丰富多元的,同时其独特的海洋历史实践活动也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海洋文化传统,存在着海洋历史实践的多体多用。如果以中国和西方的海洋历史实践及其文化传统来看,在中西方海洋文化考察的视阈中,突出表现了海洋历史实践的中西二体和中国海洋文化与西方海洋文化二用,标示了海洋文化的中外之分。

第二,从某种海洋文化的内部来看,其本质特性和价值导向为体,其种种表现为用。这一层次上的体用关系指向中西方或世界多元海洋文化内部的精神本质与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其文化之体用表征出文化的价值取向与文化主体的密切关系,使海洋文化突出表现为时代性差异,标示着海洋文化的古今之别。

在这个意义上,中西方海洋文化各有自己的体用,并且在内部表现出有体有用、体用相即、体用统一。中国海洋文化传统强调人海和谐、一体无外的精神,这种海洋文化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中国海洋文化传统的本质特性,是为体,由此形成的种种包容共存、友好交流的海洋文化现象和历史表现则为用。西方海洋文化在大航海时代强调重商主义和冒险精神,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西方海洋文化的主流价值取向,是为体,在海洋逐利过程中持守的海外拓展活动及其规则是为用,表征了海洋文化的本质和价值取向与海洋文化活动和表象之间的体用关系。

每一种海洋文化自身都处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在不同历史阶段海洋文化的本质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海洋文化的表现形式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即表现为每一种海洋文化类型内部体用的变迁。如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世界在其崛起的过程中秉持重商主义和契约精神,在海外拓展中鼓励冒险精神和利益获取,向其他地区传播了商贸精神与对个人利益的重视。及至近代,随着海洋利益的重叠与冲突,西方世界又以法治精神与民主理念为主导,通过制定国际海洋法律和规则调整利益冲突,展现了民主精神和法治理念等现代思想资源。尽管在很多方面其结果并不理想,甚至走向了反面,

^① 方克立:《综合创新之路的探索与前瞻》,《哲学动态》2008年第3期。

但其海洋发展的历史进程客观地反映了海洋价值理念与文化表达体用关系的历史变迁。在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在环中国海区域长期存在着“汉字历史文化圈”，其背后的价值取向正是“天下一体”的观念。在这种一体无外的观念下，古代中国沿海地区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南半岛等环中国海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历史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总体上建立了和平友好的交流关系，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关系和文化共同体。

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建设融入当代中国社会整体文化建设之中，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学、西学成为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理论背景。不同类型的文化系统有着各自的文化本质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不同的文化内容和文化表象。在以此文化类型形塑的海洋文化系统内部，“中学”是指中国海洋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内涵，“西学”是指西方在海洋历史上形成的进步观念和科学方法，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在指导当代中国海洋文化建构中形成的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时代精神和发展理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海洋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得以充分挖掘和弘扬，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观视阈下新的海洋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如何有别于“西学”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张岱年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先进思想的精粹。而在中国起作用的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这就不能简单地称为‘西学’了。”^①

从每一种海洋文化类型的内部来看，海洋文化的本质特性决定了海洋文化的种种表象。这种体用关系随着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文化变迁，标示了海洋文化的古今之别。随着历史的变迁，从文化自身内部的体用关系来看，在考察中西方海洋文化的视阈中就存在着西方海洋文化的古之体用与今之体用和中国海洋文化的古之体用与今之体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本质决定文化表现形式的同时，文化的表现形式也通过现象反映本质的方式不断地形塑着文化的价值内涵与特性，因而表现出文化之体与文化之用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存在于其他文化类型的优秀文化之用也可以加以借鉴吸收，成为构筑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化之体的积极要素。通过对中之古体和中之古用、西之古体和西之古用、西之今体和西之今用的扬弃，我们可以建构出海洋文化的中之今体和中之今用。

第三，从不同类型海洋文化之间及其各历史阶段之间的综合关系来看，其秉持的时代精神与价值取向为魂，其延续发展的文化生命整体为体，而其种种应用则为用。这一层次上的体用关系指向中西方或世界多元海洋文化之间的文化本质与文化表现多元互动的关系，标示着海洋文化的古今中外之鉴。

这样一来，当代中国海洋文化就表现为：以与时俱进的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秉持具有时代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的时代精神与价值取向为魂，以融会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民族性文化和近现代变革转型的走向世界与未来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为体，以吸收西方海洋文化不同阶段的先进理念与文化成果为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观”。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观”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建设过程中古今中西马的关系互动与综合创新。具体来说，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海洋文化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与核心价值，是文化之“魂”，是文化引领时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力量源泉，决定着中国海洋文化的性质和方向。这里的“中体”之“体”，是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②。体现着民族整体性的“中体”是中国海洋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生命主体和价值主体，也是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这里的“西用”之

① 李存山编：《张岱年选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80页。

② 方克立：《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47页。

“用”，是为达成中国海洋文化生命整体及其精神价值的种种应用，既包括西方海洋文化在大航海时代强调的重商主义和契约精神，也包括其在近代以来海洋发展中形成的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等现代思想资源。

通过综合创新后的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仍然是中国海洋文化，并且是经过否定之否定后综合创新、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新的中国海洋文化生命体。这一文化生命体扬弃中国海洋文化传统中体用之优弊，吸纳西方海洋文化古今体用的先进成果与历史教训，进行综合创新，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之中，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

四、结 语

可以说，中国人对于海洋文化的主体认同危机，连同整体文化认识危机，一直到20世纪末依然没有消除。近些年来，随着中国海洋事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在讨论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中国海洋发展战略及其文化理念。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开始以自己为主体逐步确立中国海洋文化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框架，逐渐走上海洋文化实践主体自觉与文化自信之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①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观”以与时俱进的思想品质，博采众长，固本开新，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成为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建构的重要指导思想，这与包括构建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理论体系在内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是一致的。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②。以此为宗旨，在中国海洋文化建设中，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观”，在综合创新中体现海洋文化建构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实践中逐渐塑造中国人理性开放的海洋文化心理结构，将海洋文化自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海洋文化建设实践中凸显构建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的主体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挖掘历史、把握当代”中，将中国海洋文化的优秀历史资源和传统进行转化创新；在“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宏大视野中，与世界多元海洋文化交流对话，彰显中国海洋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 [1] 陈先达：《文化自信既具有政治性又具有学术性》，《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
- [2] 杨国桢：《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 [3] 种海峰：《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态演进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2期。

（编辑：刘曙辉）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页。